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述论

韩洪泉

摘要:长征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80多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内容涵盖全方位宣传长征、多维度研究长征、零距离体验长征等方面。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具有传播行为的自觉性、传播过程的互动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等突出特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中国共产党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推进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的有力抓手,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突出普遍性、增强主动性、紧贴时代性,使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真正富有表现力、说服力、感染力。

关键词:红军长征;长征文化;长征精神;海外传播;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0)02-0109-10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KS122)

长征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80多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就,呈现出鲜明特征,对中国共产党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讲故事的能力,着重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展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1]新时代推进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的有力抓手,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已走过80余年历程,与长征文化的历史演进深度交融,不仅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积累了丰富史料,并且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刘铿、王汉涛以及姜廷玉、卢毅等先后对外国学者研究长征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评介。^[2-4]李守可对长征海外研究的概况、特点和意义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5]丁晓平从早期长征叙述史的视角,详细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经典作品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6]余远来认为,长征的国际传播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传播自觉的确立,得益于国际国内媒体的报道,离不开国际人士的著书推介,愈来愈具有品牌力、影响力和渗透力,对于今天做好长征的国际传播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7]龙鸿祥对《先锋报》与长征早期海外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先锋报》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有效建构了红军的正面形象,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8]胡鸿晓指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国外传媒对长征的传播评介持续掀起热潮,并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9]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情况,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比较扎实深入的研究,但关注长征前后的海外传播较多,对80多年来长征海外传播的全面梳理尚显不足;聚焦长征故事海外传播较多,基于广义长征文化的系统考察有待加强;侧重外国人对长征进行宣传评介的研究较多,对长征文化主动输出的研究相对薄弱(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如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长征的宣传报道、政治纪念、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文化交流等维度切入,着眼文化传播的双向属性,广泛搜集中外相关文献史料,纵理脉络,横析蕴涵,以期对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历时发展、

主要内容和典型特征等进行全面考察,并为新时代讲好中国长征故事提供有益镜鉴。

一、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基本脉络

长征文化的海外传播自红军长征期间就已开始,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依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传播重点和显著特征,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总体来看,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不断发展和持续深入的过程,大致围绕和聚焦于“长征与中国共产党”“长征与新中国”“长征与新长征”等不同时代主题展开。

(一)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起步阶段(1934—1949)

红军长征无疑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件大事,但当时在国际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当月的新闻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事件。直到11月9日,该报第6版才用寥寥4行篇幅进行了不实报道,指出有4万人的红军已经撤离被封锁数月的江西、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沿湖南边界行进并沿途大肆抢劫。^[10]这大概是西方媒体对长征最早期的披露,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外对长征以至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和认识的局限与隔膜。这一时期,美英等国的《纽约太阳报》《每日先驱论坛报》《时代》《生活》《星期六晚邮报》等媒体也都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这些缺乏近距离考察的报道,呈现给世人的只能说是一团乱象。直到几位亲身经历长征的传教士和在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陆续发表一些回忆文章和新闻报道,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1934年10月初,时任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瑞士人薄复礼(勃沙特)夫妇、新西兰人成邦庆夫妇、加拿大人林荣贞女士等5名传教士,在贵州旧州偶遇西征的萧克红6军团并被扣留。大约一周后,林荣贞获得自由,其后她撰文回忆了随红6军团长征8天的艰难经历,刊发于《中国大众》1935年1月号。据马军考证,这是迄今所见的西方亲历者关于红军长征的最早记载;以往认为“第一人”是埃德加·斯诺或者薄复礼,均属错误。^[11]成邦庆在被扣留413天后获释,并在《中国大众》1936年4月号上发表回忆文章《遭扣押的400天》。薄复礼被扣留时间最长,在红军队伍中滞留长达18个月之久。1936年4月获释后,很快在他人的帮助下写出了回忆录《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直译为《抑制的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1936年8月,扣留勃沙特的红二方面军(原红2、红6军团)尚在长征途中时,《神灵之手》由英国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在书中,薄复礼对红军坚定的信仰、严明的纪律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美国记者诺曼·汉威(韩蔚尔)这一时期采写的一些报道,记录了被贺龙红2军团扣留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等人对红军的观感,其中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革命信仰的坚强决心和意志、铁一般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新型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给予正面评价。^[12]由于汉威的部分稿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随同外交文件一同发回国内,无疑对美国政府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力量,是长征海外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通讯联络的中断,共产国际最初对长征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1935年1月间,在上海的赤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贝克,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信中报告了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13]二三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主任助理施特恩起草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以及补充材料,汇报和分析了红军长征的状况及前景。^[13]7月3日,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了哈马丹的《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一文,高度评价红军从江西向四川的进军,“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14]。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各国代表对中共和红军的状况十分关注,因此王明、康生等人在发言中都介绍了长征的一些情况。为进一步回应国际代表关切,8月15日中共代表团成员李光(滕代远)发表《论中国红军》一文,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近一年来的情况。^[14]以

上几种报告或文献,主要依据国内外尤其是国民党方面的公开报道,对红军长征的信息进行梳理、判断、分析和传递,使苏联和共产国际各国代表对长征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种传播和认知最大的不足,就是并非长征亲历者的介绍,因此大多语焉不详,且多有失实之处。

1935年9月,陈云奉命抵达莫斯科。10月15日至22日,陈云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海外系统阐述长征历史,现整理稿近2万字。报告主要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前期的经过、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并分析了红军长征之前所犯的错误。陈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他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长征有了真正全面深入的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指出:“这将是极珍贵的材料。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与我们迄今看到过的完全不同形式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一个切切实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机勃勃的党。我认为,这些材料应该发表,加以广泛宣传。”^[15]稍后,这一报告被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署名“施平”。陈云从上海转赴莫斯科之际,还写作了另外一篇系统介绍长征的重要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杂志和《救国时报》上连载,同年7月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作者署名“廉臣”。

1936年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采访,是长征传播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斯诺在苏区直接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战员,并用相机拍摄了他们的形象。结束采访回到北平后,斯诺全力以赴投入写作之中,大量反映红军包括长征情况的稿件,相继投寄给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以及英美各国的重要报刊,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在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量达十几万册。1938年2月,由上海地下党组织,胡愈之筹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问世。^[16]长征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虽然只占了1章约1.8万字的篇幅,但它同毛泽东的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1章都是全书最重要的篇章,其中《大渡河英雄》等更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几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为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人们了解长征、了解中国的经典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受到斯诺的影响,一些西方记者和友好人士(如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等)纷纷前往苏区采访,撰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的作品,长征往往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甚至是高潮部分。这些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大大拓展了红军长征的世界影响。

(二)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阶段(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西方世界在很长时间里对中国实施封锁,但对于长征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中国在推动长征文化主动“走出去”方面也卓有成效,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整体呈现曲折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长征文化海外传播主要可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那些当年亲历长征或到苏区采访过的外国人,继续在海外传播长征文化。如史沫特莱曾在1937年到延安采访,特别是对朱德进行了几十次采访,积累了大量素材。由于战乱等原因,史沫特莱撰写的朱德英文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直到1950年才完成,1955年以日文版出版问世,1956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本。在《伟大的道路》中,“长征篇”包含4章内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篇幅。该书出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社会引起一定反响。再如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王安娜,于1964年出版了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书中以相当篇幅记述了长征的历程和影响,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传播。又如长征的亲历者李德,1969年在民主德国《地平线》周刊第23—28期连续发表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在对这一长文进行补充修订的基础上,1973年由迪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1932—1939)》。在这本书中,李德对当年尤其是长征时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歪曲叙述,并对一些中共领导人进行攻击和诽谤。李德此举显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

期和历史背景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做法。^[17]

二是外国人士出于对长征和新中国的关注,到中国进行访问和调查,并在世界上传播长征故事、赞颂长征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韩素音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访问,采访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和普通战士,并沿长征部分路线实地踏访,于1972年在英国出版了《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由于韩素音在英美文学界的地位,她在这部英文著作中对长征的描述和评价,影响了一大批西方人。

三是外国学界从研究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角度出发,对长征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主要有法国布瓦的《长征》,英国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美国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苏联西基梁斯卡娅的《中国红军的长征》,日本冈本隆三的《长征——中国革命进行考验的记录》以及《中国革命长征史》《长征秘话》等。此外国外刊物还发表了一大批研究和介绍长征的学术论文及新闻报道。

四是国内组织力量翻译了一批长征文化作品,由外文出版社等面向海外传播。1952年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在国内上演后引起轰动(1959年改编为同名电影),成为长征文艺的经典作品,1956年该书英文版(*The Long March*)由外文出版社出版。1958年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即出版了英文版(*On the Long March with Chairman Mao*),其后又陆续推出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印地文、缅甸文等许多语种版本,在海外产生较大反响。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长征故事》(*Storied of the Long March*)、《长征回忆录》(*The Long March: Eyewitness Accounts*,据《星火燎原》第3卷选译)等作品。此外,歌舞《长征组歌》、电影《万水千山》、交响乐《长征交响曲》等经典文艺作品流传海外,都产生了良好效应。

(三)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繁荣阶段(1978—)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各国加强对中国的了解的主观愿望更加强烈、客观条件日趋优越,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掀起新的热潮,形成了持续繁荣的局面。40多年来的长征文化海外传播,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重走长征路为基础,推出了一批全面介绍长征历史和深入探究长征精神的精品力作。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夫人来到中国,不仅联系和采访了许多亲历长征的健在者,而且不顾年老多病重走长征路,历时74天,行程1万余里,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由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等作了大量报道。该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其夫人夏洛特则著有《长征日记:中国史诗》。2002年至2003年,两个英国青年李爱德和马普安沿着中央红军的路线重走长征路,历时384天,行程6100公里,李爱德则成为继长征时期李德等人之后第一个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2005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出版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详细记录了重走长征路的见闻和思考。同时出版的还有画册《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按行程展示了长征路上的旧风新貌。

二是围绕长征历史的学术研究取得新进展。如本杰明·杨(杨炳章)和陈志让曾以《中国季刊》为阵地,围绕遵义会议的相关问题展开过“回合式”学术论争。^[18]本杰明·杨《从革命到政治: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的出版,则成为西方第一部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专著,填补了国外长征研究领域的空白。由于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因而纠正了一些以往研究中的偏差和讹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红军长征前后的历史。由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该书的一些观点与传统观点不尽一致,然而这也正是该书的特色所在。^[16]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还有法国胡继熙的《他们曾是十万人:1934—1935》,美国杨·海伦的《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英国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等。此外,许多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也都会浓墨重彩地描写长征。

三是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长征,注重新老长征的比较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长征”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代名词,具有特殊的时代涵义。1985年,澳大利亚出版商哈罗德·威尔顿与20多名中外摄影家历时两个多月,沿着长征线路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于次年出版了《中国——长征》大型画册,以7种语言在全球40个国家发行24万多册,对于西方了解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和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起到了极大帮助作用。2011年,威尔顿集团与青岛出版集团合作启动《中国——新长征》项目,组织了由两位外籍作家和14位中外摄影师组成的主创团队,在重走长征路的基础上拍摄2万多张精彩图片,最终选择600余幅代表性图片编排成书。该画册以中、英、阿、德、法、西、俄、日等多语种面向全球出版发行,展示中国人民阔步新长征路的精神风貌、客观变化和历史成就。

四是推动国内长征文化作品“走出去”,翻译出版了一批经典作品。长征故事(回忆录)如魏国祿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On the Long March as guard to Chou En-lai*,有英文、日文、阿拉伯文等多种版本)、刘伯承的《回忆长征》(*Recalling the Long March*)等,文学艺术作品如黄镇的《长征画集》(*Sketches on the Long March*)、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The Red Ribbon on the Earth*;王素改编,沈尧尹绘图,陈海叶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沈尧尹的《长征:1936》(*The Long March:193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等,学术著作如徐占权、徐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The Long March of China's Red Army*;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等。此外,近年来国内举办长征纪念活动时,一般都会邀请外宾参加,如2016年举办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曾开设外宾专场,邀请103位在华外国专家、商务机构代表以及163位驻华使节集中参观,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主要内容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三个方面:全方位宣传长征,多维度研究长征,零距离体验长征。

(一)全方位宣传长征

长征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件大事、一个壮举,如何把长征故事准确、全面地传向全世界,是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首要任务。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今,长征文化海外传播一方面始终围绕这一任务展开,同时又在各个历史时期于传播的重点内容上各有侧重。如长征时期及稍后,以实事求是地反映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为主,旨在打破国民党政府的信息垄断和任意污蔑,从而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实相,使中共和红军被更多人正确了解,从而树立正面形象,获得更多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上关于长征文化的传播,更多从长征与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掌握政权、长征与毛泽东崛起的关系等角度入手,旨在为西方认识红色中国提供借鉴,同时一些知名人士也认识到长征精神的普遍意义,指出其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现实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关于长征的宣传更趋多元多样,呈现出全方位态势,在重视长征历史、长征精神的同时,日益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事业即新长征,关注长征文化的多元传播和丰富体验,也相应生发出更大的宣传效应。总体来看,全方位宣传长征是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就宣传主体来说,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就宣传重点来说,适应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和需求而各有侧重;就宣传内容来说,举凡长征历史与长征精神、历史上的长征与新时期的长征、世界史上的长征与中国史上的长征等,都在范畴之内,并将之并列比较宣传;就宣传性质来说,总体上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主,也有一些失真宣传甚至负面报道;就宣传效果来说,总体上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正面形象,但仍需要注意正确引导。

(二)多维度研究长征

几十年来,长征成为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无法越过的一环。作为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基础要素,海外长征研究具有许多与国内长征研究不同之处。海外长征研究者在研究

动机、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都有许多与国内研究者迥异之处。有研究者总结海外长征研究的特点,主要有研究兴趣始于长征本身的魅力、研究史料侧重调查研究、研究立场呈现客观中立、研究结论倾向于高度褒扬、研究观点难免存在偏颇等。^[5]其优势和长处在于,重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和考察,重视对沉潜于历史中的精神因素的研究和分析,重视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和现地的踏访获取第一手材料,重视从长时段、大视野、多学科切入展开研究。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之所以能成为长征文化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与他们在我国所下的深入调研采访、尽可能搜集资料的功夫是密不可分的。海外长征研究中的一些失真、失实、失误,既有部分研究者自身立场、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历史资料局限、认知理解隔膜等方面的因素。总体而言,海外长征研究对在国际上塑造中共正面形象具有积极意义,对深化国内长征研究具有借鉴价值,一般应以包容宽容的心态对待。萧克当年看到《神灵之手》的中译本后,曾感慨地说:“薄复礼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19]这番论述,无疑是对薄复礼长征叙事学术价值的客观评价,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 零距离体验长征

长征文化具有线性文化的典型特征,可体验、可重复、可感知是其特性和优势。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重走访、重踏勘、重领悟也是一个鲜明特点。早期的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者,大多是长征亲历者(如陈云、薄复礼等)或对长征亲历者详细采访者(如斯诺、史沫特莱等),对长征的体悟和感知非常深刻。新中国成立后,重走长征路、零距离体验长征,逐渐成为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和一项重要内容。零距离体验长征,也是后来的传播者准确认知长征的有利条件。1981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带领全家走访了长征路,并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寻访毛泽东的长征路》一文,指出:“要是对于长征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对这个民族及其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也就会有更多的了解。”“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揭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20]这种更深刻的认识,显然得益于他对长征的真切感知。几十年来,不仅国内重走长征路蔚成风尚,外国人来华重走长征路者也已不鲜见。这些重访者中,既有布热津斯基、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知名人物,也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普通人士;既有为了解长征历史而重游者,也有为感悟长征精神而重走者;既有个人或两三人自发来华者,也有集体或团队应邀来访者。此外,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也经常会有一些以长征为名的步行或骑行活动,这种长征体验“本土化”的现象,自然也是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有趣实践。

三、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突出特征

长征文化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其海外传播的突出特征。综观80多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历程,呈现出鲜明的自觉性、互动性、多样性等特征。

(一) 传播行为的自觉性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主体十分广泛,从国籍来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从职业来看,有记者、作家、学者、军政要员、青年学生等;从阵营来看,有中共党员和红军将士,有立场相对中立者,也有对立阵营或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海外传播长征文化,其行为普遍具有自觉性特征,或曰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较强的功利性。如滕代远于1935年在苏联发表《论中国红军》长文,主要依据国民党方面的新闻报道,对红军长征进行分析、判断和介绍,揭破敌人的谣言,尽量还原事实真相,丰富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对长征的认知。又如陈云到达莫斯科后所作的报告及其后整理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一文,特别是《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和发表,更体现出中共方面对传播长征史实、塑造正面形象的自觉性。再如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与上海地下党及宋庆龄联系,希望推荐一位立场中立客

观的外国记者到陕北,以利于打破敌方信息封锁和肆意诋毁,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这与正在积极寻求到苏区访问的斯诺的期望恰好契合。双方的自觉意识,促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陕北之行。斯诺到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和杨尚昆即联名发函,向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21]这部《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红军组织编写的关于长征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历史文献之一,也是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素材之一。几十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沿续了这种自觉意识,也使传播效果有了切实可靠的保证。

(二) 传播过程的互动性

能否产生有效的互动、形成循环的回路,是传播效果的重要体现。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性,主要体现在优秀作品的译介与推广、热点问题的论辩与批评、相关活动的协调与合作等方面。长征文化传播过程中,许多经典作品如《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组歌》等,都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墙外开花墙里香”的过程。再如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杂志和《救国时报》上连载后,同年7月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救国时报》编辑部还决定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和同在该报连载的杨定华(邓发)《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共3篇文章合编为《长征记》一书。这两种文献流传到国内后,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明月出版社)、《长征两面写》(大文出版社)以及《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等书名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22]又如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国外产生广泛影响后,国内很快出现了《长征秘闻》《长征新记》等不同中译本,秦兴汉后来又出版了《让世界都知道红军长征:陪同索尔兹伯里踏访长征路》(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索尔兹伯里中国之行和长征叙事的背景及意义。

针对长征海外传播中的一些失实甚至错误,中国也会以适当形式进行讨论或批评,以正视听,以清源流。如针对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长征史实进行的歪曲和捏造,为澄清历史事实、消除不良影响,1981年《红旗》杂志以伍修权的署名发表了《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一文。^[23]伍修权在后来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也说,李德想通过自己的回忆录“粉饰自己的过失并诋毁毛泽东等反对他的人是徒劳的”。再如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提到:“我们知道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是12000到13000里。”西方记者马上想到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不那么长的长征”。这一说法很快传遍全世界,曾列雅虎新闻点击率前5名,世界各种报纸上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报道很快达到100多篇。对此,中国专家进行了严谨认真的考证和客观辩证的分析,指出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既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历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一条路线,没有严格按长征路线行走而妄下结论是很不妥当的。^[24]

(三) 传播形式的多样性

80多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在理念上与时俱进,在方法上不断创新,在路径上因时制宜,适应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大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收到良好效果。早期的传播以新闻报道、回忆录以及散文、诗歌、照片等为主要形式,以报纸、期刊、图书为主要载体。其中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在1936年便由毛泽东抄写给斯诺,并被收入《西行漫记》,成为最先走向世界的毛泽东诗词,影响至今不衰。后来的传播过程中,文学、艺术、影视、歌舞等丰富的表现形式走上前台,歌舞《长征组歌》和电影《万水千山》等在罗马尼亚、越南等国家演出放映都大获好评。其后,学术论文和著作等也成为重要的传播形式,电视剧及纪录片等深受欢迎。如电视剧《长征》在韩国连续多次重播,纪录片《长征》获美国CINE金鹰奖,意大利等国家也获准拍摄了长征主题纪录片。1988年,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琼·弗里茨的《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险途》出版。《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弗里茨夫

人为少年读者写了这本叙述长征的书,同时完成了一件公益服务:当此中国及其亿万人民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日益凸显之时,长征的历史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了解并加以思考的。长征是另一时空下,由另一些人在不同的旗帜下完成的类似于我们美国革命的史诗。讲述这些英勇传奇的是这样一些男女,他们为了一项他们认为胜过生命的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饥饿、疾病、危险、严寒,难以通过的高山、河流和荒漠,强大的敌军,这些都不能阻挡他们前进。”^[25]法国出版的彩色连环画册《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由该国著名学者胡继熙撰文,著名连环画家迪皮伊绘画,出版后在法国文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新时代讲好中国长征故事的几点思考

长征故事发生在中国,长征文化则属于世界。回顾80多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历程,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提供了生动案例和宝贵经验。正如美国学者安东尼·加拉文特所说,“长征仍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新长征路上。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长征故事,仍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努力践行的课题。

(一)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是民族与世界的交汇,必须在突出普遍性上下功夫

长征文化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方面,长征发生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文化是党史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长征(远征)故事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长征精神是人类若干共有精神价值的集中呈现;长征文化具有穿越时空、跨越地域的影响力。在世界上,人们常常把红军长征与以色列人出埃及、亚历山大远征、希腊远征波斯的大撤退、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美国的先驱们从密苏里转辗到犹他州、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等世界史上的重大行动相提并论,以此彰显长征的世界意义和超常之处。索尔兹伯里曾借斯诺的话表达对长征及长征精神的理解:“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26]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7]2000年,长征曾被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人类1000年》评为1000年来人类最具影响力的100件大事之一。新时代讲好长征故事,必须着重把握其普遍价值,讲清长征故事的世界意义,使长征精神、长征文化在世界上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在长征文化海外传播中,特别是我们在国际上讲述长征故事时,还存在重个性轻共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种文化传播流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难以引发共鸣,遑论宣传效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一举世瞩目、为无数国际友人称道的人类壮举本应该成为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成为展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品牌,但我们许多当代作家却在想象和书写长征故事时止步不前了。”^[28]长征文化传播必须充分认清内外之别,尤其是在海外传播中必须在着力增强普遍性上下功夫。以长征精神为例,在海外传播长征精神,既要彰显长征精神的民族意义,也要关注长征精神的普遍意义,讲清长征精神所蕴涵的理想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等元素,挖掘长征精神对全人类的共性价值,引发受众的共鸣,真正起到传递价值、赢得理解、达成共识的作用。

(二)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是内向与外向的统一,必须在增强主动性上下功夫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具有双向属性,但工作重心和主动权应该是在国内。长征文化源于中国,辐射世界,意义重大,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增强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突出表现为各自为战制约了传播规模、固步自封制约了传播范围、被动应对制约了传播效果,相关领域的力量还没有充分整合起来,各方面的积极

性还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国内长征文化的许多优秀作品还没有推广出去,而主要原因还在于主动性不强,缺乏主动协调、主动谋划、主动引导、主动交流的意识 and 能力。一是要统筹力量。要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方向,协调政府和民间两股力量,兼顾社会和经济两种效益,在政府的主导和指导下,注重调动和发挥企业、社团的作用,整合长征文化传播的相关力量,明晰责任,各司其职,通力协作,高效融合,制定相关制度,形成长效机制。二是要加强设计。要加强长征文化学科研究,加强长征文化要素梳理,加强长征文化资源开发,把长征文化的基本问题搞清研透,为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要制定长远规划,注重顶层设计,主动设置选题,掌握舆论先机,建构话语体系,培育经典作品,真正增强传播的力度和效果。三是要推动交流。要把“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起来,积极与海外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等建立联系,形成可操作、有效益的常态化合作机制。要加强学术层面的交流,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一般问题上则做到求同存异、抓大放小、舍末逐本,加大海外研究成果引入力度,为国际学术研究创造条件。要善于借风扬帆、借船出海,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活动,在多个战线打开局面、取得突破、造成声势。

(三) 长征文化海外传播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必须在紧贴时代性上下功夫

文化当与时俱进,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尤应如此。80多年来,长征文化海外传播顺势扬帆,适应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在传播的重心、主题、途径、手段、方法等方面与时创新,成绩斐然。进入新时代,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必须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在紧贴时代性上下功夫,推动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实现历史性突破。一是要聚焦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已产生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长征文化所揭橥的共性价值和内核,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因此长征文化海外传播可以也应该自觉围绕这一新理念来展开和进行。二是要突出新线路。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把“一带一路”这一地理区域,作为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重点线路,使“地球的红飘带”在“一带一路”生根、开花、结果,对于增强战略互信、提振奋斗激情、促进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三是要彰显新征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当代中国新的长征路。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的基点,要放在走好新的长征路上,做到扎根历史、传承精神、建设文化、开创未来,推动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对接,共同开创美好明天。四是要创造新形式。要适应信息化社会,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开发建设网站软件,占领网络阵地,打造文化品牌。要适应多样化需求,考虑到各类人群的不同品味及接受能力,以各种小型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近受众。要适应国际化特点,在语言、内容、表达等方面力求兼容,以“接地气”的形式,“入乡随俗”的理念,使国际受众便于理解、易于接受,使长征文化海外传播真正富有表现力、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11.
- [2] 刘铿. 长征,需要继续讲述的故事——美国学者长征研究述评. 军事历史,1996,5.
- [3] 王汉涛. 外国学者评长征.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7,1.
- [4] 姜廷玉,卢毅. 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80年来外国学者笔下的红军长征. 北京日报,2016-10-17.
- [5] 李守可. 中国共产党对长征精神的意蕴传承与价值重塑.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3:92-99.
- [6] 丁晓平. 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 [7] 余远来. 论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 中国军事科学,2016,6.
- [8] 龙鸿祥. 《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 江西社会科学,2019,4.
- [9] 胡鸿晓. 新时期国外传媒对长征的传播评介.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0.
- [10] 赵巴阳. 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6.
- [11] 马军. 她才是第一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现代中国与世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80.

- [12] 董佳. 一个美国记者笔下的红军长征. 群言, 2016, 10:49-51.
-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349-361;374-382.
-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687;736-747.
- [15]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馆藏. 全宗495, 目录18, 卷宗1012.
- [16] 潘世伟, 徐觉哉. 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29;319.
- [17] 卢弘. 解谜李德与长征.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404.
- [18] 萧军.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 中共党史研究, 1996, 5:49.
- [19] 萧克. 萧克将军谈薄复礼和他的回忆录//薄复礼.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张国琦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6:8-11.
- [20] 布热津斯基文章《寻访毛泽东的长征路》(上). 参考消息, 1982-01-26.
- [21]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红军长征记.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14.
- [22] 蔡晖. 共和国成立前的长征报道. 军事记者, 2013, 3:66-67.
- [23] 伍修权. 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 红旗, 1981, 23:13-18.
- [24] 王新生. 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几个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 2006, 5:65-71.
- [25] 李志明. 向美国孩子讲述长征. 人民日报, 2006-10-17.
- [26]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 过家鼎, 程镇球, 张援远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8:3.
- [27] 迪克·威尔逊. 一九三五年长征. 李淮译. 解放军报, 2006-09-08.
- [28] 郑润良. 长征文学——寻求小说文体的突破. 解放军报, 2016-10-18.

Research on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e

Han Hongqua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ong March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80 years,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eriods, mainly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Long March, the study of the Long March,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Long March, etc.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e show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consciousness i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the interaction in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the diversity in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haping the good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oting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s a powerful grasp of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through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Key Words: the Long March; the Long March culture; the Long March spirit; overseas communication; Chinese stories

■收稿日期:2019-01-07

■作者单位:韩洪泉,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1602

■责任编辑:汪晓清